

南宋金元間的山東忠義軍與李全

一、女真帝國之崩潰

在白山黑水間一枝不滿萬人的騎士，一蹴而攻略到北中國的大陸。從公元一千一百十三年完顏阿骨打稱兵起，到一千一百二十二年，九個年頭滅了契丹帝國。一千一百二十四年起，到一千一百二十七年，四年之間，顛覆了北宋帝國。又經過二十六年，到一千一百四十三年，降南宋爲藩屬——秦檜作相，趙構稱臣，國威發揚到頂點。以後直至一千一百六十一年，金主亮渡江之前，一直是君臨東方大陸的一個大帝國。中間又經過大定的治平之世三十年（一一六九—一九〇），制禮作樂，儼然漢唐盛世，文治也臻於極盛，這正是「日中則昃，月盈則滿」的時候了。在金章宗明昌到太和的時代，大時代的暴風雨，已經孕育在歌舞昇平的氣象之中。北方大熊——蒙古族已逐次完成了統一，選擇了統御他們的領袖，贊下的事情便是向長城之內進發了。在裡面「猛安謀克」統治的漢人也漸漸出現不安與暴動，朝廷之上，酣飲着顛頽的騎士貴族，草野之中，潛滋着反抗的揭竿之徒，與失掉土地的無數窮民的呻吟愁嘆之音，意味着大變亂的將要來臨。原來女貞的開國，以囿於自然條件一種人稀少，所恃在於騎射精強，遼人嘗謂「女真兵若滿萬，則不可敵」。在阿骨打寧江之役後，兵才滿萬（註一），游牧部落，本是舉族皆兵的，假定加上老人婦孺，在興起之時也不過四五萬左右，所以在勝利以後，便採用收容俘虜的辦法，將渤海契丹和漢人，都編在「猛安謀克」的統御之下（註二）。太祖收國二年詔曰：

「自今奚漢，渤海係遼籍女真，室韋達魯，古元惹鐵驪諸部官民，已降或爲軍所俘獲，逃而還者，勿以爲罪，其酋長仍官之。」

足證當時極欲充實兵民戶口的情形。天輔初年，仍是極意招撫降附，平遼之兵大抵用的遼奚「怨軍」做先鋒。靖康北狩，依然撤兵北返，先立偽楚，後立偽齊，並不是有愛於張邦昌與劉豫，實在是所得的成果太大，腸胃太小不能消化，這正是和耶律德光殘破石晉，仍不能守的情形一樣。小部落發展太快，多半如此。

爲着補救這種缺點，便採用種人分屯各地與土着結姻親，混合血統擰取生產的辦法，如太祖時以「婆盧火」墾植泰州（註三），熙宗時猛安謀克分領民戶，世宗時更採用硬性的移民屯墾的辦法，用少數的種人，統治大多數降附人民，打算長治久安之計。至於塞外各部族呢？則把他們編爲軍戶，這便是世所周知的「乚軍」制度，它是抄襲契丹的部族軍隊的方式，更進一步的軍事統治，與政治組織類混合在一起。當時的乚軍與各部族軍隊；計有迭刺部（永安三年改爲土渾泥石合節度使）與唐古部（永安三年，改爲部魯火札石合節使），兩部轄五乚軍，戶五千五百八十五，另有助魯族部，烏魯部族，石壘部族，萌骨部族，計魯部族，李特本部族皆稱是，這大概是守長城塞外各部族。其次是「西北西南二路之乚軍，共十，曰蘇漢典乚軍；曰耶刺都乚軍；曰骨乚軍；曰唐古乚軍；曰露古；曰乚木典乚軍；曰萌骨乚軍；曰胡都乚軍；曰咩乚軍（註四）。這樣一來，把邊防交付與歸附的各部族，女真本族大多遷居到河北山東河南各處，和漢人雜處（註五）而以「合札謀克」（註六）拱衛根本。

這是女真帝國基本的統治方法，却製成了組織鬆弛，內外脫節和種族界限，因生活競爭所擴大的仇恨。這個游牧民族到中原以後，很決的吸收漢族文化，尤其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儒學，在太祖阿骨打時起已經繼承了中國契丹制度文物。滅北宋以後，宣和內府的圖書彝器，遷到中都，太宗吳乞買時已留意「議禮制度」，熙宗亶時，居然和侍臣大談其「貞觀治要」了（註七）。完顏亮雖然昏暴，却具有欣賞文學的天才，他所以伐江南便是讀了「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」柳三變一首西湖詞，而動了湖山佳麗的妄想（註八），最盛的是金章宗璟明昌泰和之間，幾乎純粹文儒之治，這樣便繼承了中

原民族的文柔與奢靡的生活，政治上表現爲緩慢迂闊，高談其「治體相度」，官僚政治的麻痺，繼續地在腐蝕全部政治機能（註九）。

這兩個原因之外，還加上女真的簽軍的弊政，劉祁說「金之兵制最弊，每有征伐及內釁，輒下令簽軍，使遠近騷動，民家丁男，若皆強壯，或盡取無遺，號泣動夫鄰里，嗟怒盈於道路！」屈指女真入中原之後，除去金世宗，大定二十幾年之間，未動什麼兵革，其他皆有征伐，老百姓在當時對現狀的不滿，可想而知了。

金朝的內部既如此，她更有與日俱深的外敵，威脅着她的東西兩邊，這便是新興的蒙古和時臣時叛的阻卜——塔塔兒，根據近人王國維氏的研究，蒙古人在修金史時，曾隱蔽了蒙古和金的一些和戰史實，在一切的文献中根本消滅「韃靼」字樣，故意顛倒亂韃靼名稱爲「阻韁」（註十），但是參照金史各傳，金自皇統以後，嘗有對北邊之用兵，南宋人許多有關蒙古史料，更盛加煊染蒙金的關係，除去南史野史材料，王氏斷爲僞造外，其可信者爲。

一、宋史洪皓傳「紹興十二年（金皇統二年）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，詔歸之，皓謂秦檜曰彼方困於蒙古，姑示強以嘗中國……」。

二、三朝北盟等編：「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，金遣翰林學士韓汝嘉宣諭公文「向來北邊有蒙古韃靼等，從東昏主時，數犯邊境，自朕即位久已甯息，頃准邊將屢申此輩，又會作過，比之以前保聚尤甚，衆至數十萬。」

三、樓鑰北行日錄……「蒙古作梗，太子自去邊頭議和半年未決……」。

這可證明自太子大定以前，蒙古對金的爲害之深，所以才有內部的簽軍頻繁。王氏又考證金史，夾谷清臣傳內族宗浩傳，內族襄傳，斷定章宗明昌承安間，北邊兵事，是對蒙古用兵，夾谷清臣的栲栳之役，其所攻即蒙古合答斤，撒勒只兀惕兩部（成吉斯汗與王罕所攻者），內族宗浩傳中之廣

吉刺部，即是秘史和聖武親征錄之弘吉刺部，合底忻，山只崑兩部，皆蒙古奇渥溫（按應作李兒只斤氏）仍係前考之合答斤撒勒只兀惕兩部，故王氏謂「自明昌以來，先後遣承相夾谷清臣內族襄行省於臨潢北京，又遣尚書右丞夾谷衡行院於撫州，出重臣以臨之，築濠塹以備之，而明昌六年，夾谷清臣

撈灤之役，承安元年內族襄，斡里札河之役，三年，內族宗浩移米河之役，最為大舉，以今考之，惟斡里札河之役，係伐韃靼，其前後二役皆為蒙古也」（註十一）。

北邊的部族；塔夕兒（韃靼）最老，唐宋以來遷徙叛服不常，突厥族的克烈部乃蠻部，均與塔塔兒受金封號的羈縻。只有蒙古族自合不勒罕統一乞顏部後，聲勢日大，人口日漸繁殖，又和克烈部結合，實在是方興的勁敵！但以紀傳考之，金人對蒙古的知識，似乎缺乏的很。邊防上對塔塔兒與蒙古是一視同仁的，並不知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，扶塔塔兒以制蒙古，反而在鐵木真初起的時候，資以封號，使之坐大。對其擊滅克烈乃蠻兩部和建號大汗的事實，也似乎懵無所知，只有一兩個投機份子，如移捏刺兒耶律阿海之流，却早已委贊投降甘作內應了（註十二），尤其是金對蒙古的防禦與撫馭均沒有辦法，如史載：

「初蒙古主入貢於金，金主時為衛王，章宗使受貢於靜州，蒙古主見衛王不為禮，王欲請兵攻之，會章宗殂，金主嗣位，有詔至蒙古，傳言當跪受，蒙古主向金使曰：「新君為誰？」曰：「衛王也」。蒙古主遽向南面唾曰：「我謂中原皇帝乃天上人，此等庸懦，亦為之耶？」（註十三）

「先是金納哈買住守北部，知蒙古將侵邊，奔告於金主，金主曰：「彼何敢然？且無讐何能入也」，買住曰：「近見其諸部附從，西夏獻女，而造箭製楯不休，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，蓋欲惜民力也，非圖我而何？」金主以為生邊隙而囚之」（註同上）。

足證金廷的顛頽，果然成吉斯汗的鐵騎一踰陰山，守邊的汪古部——白達達，已經先期納降，引導長驅，轉眼間便如飄風驟雨，席捲東北西北兩邊，而進到「中都」的城下了。

二、揭竿而起的山東豪傑

所謂「山東忠義軍」的前身，便是金史所指的「紅襖賊」據畢氏續通鑑，及金史宣宗，哀宗兩本紀，關於紅襖賊的記載，有以下的各條：

貞祐三年八月乙酉，紅襖賊周元兒陷深州，安平，無極等縣……

貞祐四年正月丙寅，紅襖賊犯泰興，往博州，興定元年春正月，花帽軍作亂於泰州，（按花帽軍

為張惠所統率，亦係民兵，為盧鼓椎所迫降李全，見李全傳）

興定二年三月戊午，紅襖賊犯徐邳，壬辰河北行省敗紅襖賊；進至密州。

自興定以後，所紀的紅襖賊，皆山東忠義軍的活動，茲不再抄。

現在要尋究山東豪傑蜂起的原因，主要的是；蒙古攻金，所造成北方大陸的真空。當成吉斯汗的鐵騎進入長城以後，女貞王朝的統治階級，正像病人遭受掌帥的打擊，一下便昏倒了。前方的兵隊，主力是所謂丸軍，尤虎高琪所率，一接觸便敗退下來。大同一居庸間的守軍，像潮水似的崩潰，敗兵之將的胡沙虎，竟把昏庸的皇帝——衛紹王殺了。大敵當頭，而引起內部爭奪政權的一幕鬧劇。根本之地——遼東，已在耶律留哥，蒲解萬奴，張鯨這些人物的導演下，投降的投降，自立的自立了。白山黑水的根據地，再不容完顏氏，打回老家！於是很快的便完成蒙古人的游動擄掠的戰略目的，「剪其枝葉，因其根本」，所有自遼河到黃河的流域的州郡城村，無一不是韃靼鐵騎蹂躪之處，大規模的屠殺，空前的掠奪，使得習慣安居樂業的北方人民恐怖流亡。狡黠的，柔懦的，便想以投靠來保全身家，強悍的便揭竿而起，從下面的文獻紀載，我們可以找出以上的論據：

一、烏沙堡白登之役，『胡沙虎以麾下突圍走，野狐嶺之役，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大兵，屯於野孤嶺，次日帝聞金兵至，投箸而起，與九斤等戰於野孤嶺北口之獾兒嘴，本華黎先登陷陣，帝率諸軍繼

至，九斤大敗，伏尸偏野，金之精兵猛將歿於此……冬十月，者別乘勝入居庸關，游兵至中都城外

(註十四)

二、至甯元年懷來之戰：『至甯元年，完顏綱行省事於縉山，徒單鑑使人謂綱曰：「高琪駐兵縉山，士皆思奮，與其行省親征不若益兵爲便」，綱不聽，徒單鑑，復使人止之曰：「高琪措畫已定，彼之功即行省之功」，綱不從，至縉山，遂大敗；此役：軍中措劃，本出高琪；其戰事始於懷來，終於縉山，其重要將領爲高琪，則重要軍隊爲其所部之効軍無疑也』。(註十五)

三、蒙古兵分三道，剿略大河南北，太祖八年冬十月，帝自將大軍，攻克涿易二州，分兵三道，命皇子朮赤，察合台，窩闊台爲右軍，循太行而來，取保，遂安，安定，邢，洛，磁，相，懷衛等州，皇弟合撒兒斡陳那顏布札爲左軍，循海而東，取東平，濰，薊等州；帝與皇子拖雷爲中軍，取雄，莫，安，河間，滄，景，獻，泰安，濟南，萊，沂，等州，別遣木華黎攻密州；金主乞和，帝曰：「山東，河北州縣，盡爲我有，汝所守惟中都耳」(註十六)

四、遼東之叛：『耶律留哥契丹人，仕金爲千戶，太祖起兵，金人疑契丹遺民：留哥不自安，遁至隆安韓州，聚衆割掠，數月間，衆至十餘萬，惟留哥爲都元帥(註十七)，蒲鮮萬奴，女真人：金宣宗立，萬奴擢咸平招討使，太祖九年與耶律留哥，戰歸仁北，敗績：思據地自擅：十年正月，遂據東京叛，自稱天王，國號大眞，建元「天泰」』(註十八)

『錦州張鯨，聚衆十餘萬殺節度使，自稱臨海郡王，亦來降：以鯨總制北京十提拉兵：鯨稱疾，逗留不進，也先執送行在誅之；鯨弟致據錦州叛』(註十九)

五、蒙古殺戮與漢人降附，『蒙古主凡破金九十餘郡，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，金帛子女，羊畜牛馬席捲而去，屋廬焚燬，城郭丘墟(註十九)，成吉思汗，既出居庸關，收所虜男女皆殺之，其數不可勝計(註二十)，蒙古華黎，統兵侵金，所過殘破，永清人史秉直聚衆謀曰：「方今兵亂，吾

家百口，何以自保？既而知降者皆得免，乃率里中數千人詣涿州軍門降(註二十一)。

以上這些紀載，足以說明當日女真帝國迅速崩潰的情形，和北中國人民遭受蠻族侵略狼狽恐怖的狀態。人民的鬪志沒有，怨憤隨之，向心力解體，離心力代之，因而蘊蓄在心頭的民族仇恨，和歸宗意識，油然而起，是以自貞祐初年以後，到處看到「紅襖賊」「黑旗賊」和據砦保寨的民兵蠢起了。

至於山東豪傑之所以起來的，也自有其歷史的傳統與地理環境的造成。我們知道自北宋，澶淵之盟以後，宋遼對峙，宋人所恃的三關之險，多在今河間滄景一帶，大名在宋爲北京，軍事上，是河北用兵的神經中樞。東平路與天雄軍，是宋北方的重鎮，皆在今河北，山東兩省，這些地方地多斥鹵，人口密集，萑苻之徒，最易活動，這是一。京東（宋人以汴京以東爲京東路），歸德至徐州，延至魯南一帶，人多强悍，向爲盜藪，如宣和年間，「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江淮」的史實所演成梁山泊的故事，即其一證，蘇軾守徐州日利用利國治，官家出費訓練治徒，做民兵捕盜，重用當地的豪傑，使地面肅清，（此事載蘇軾在徐州上封事書，本傳不詳），他曾痛論京東盜風之不可小視，這是二。河北自韓琦作相，訓練弓社一鄉兵，王安石新法，團練保甲，幾十年間，養成民間的武備，演化成靖康年間的各部忠義，那時重要的忠義據史記載如下(註二十二)：

一、李成，雄州弓箭手，雄聞河朔，積功爲本縣令……以衆來歸，官防禦使。（此人後以汪黃牽制復叛爲金，與劉豫共爲南宋之患）。

二、建炎元年，張慤立，河洛之民憤於兵亂，自結巡社，請依唐人澤潞步兵，三河子弟遺意聯以什伍。

三、王善者，有衆二千餘，皆山東遊手之人……。

以上還是遠在南宋初年。便是金主亮，南征和韓胄北伐的兩個時代，也還見有山東豪傑的活動。金主亮南征的前一年，王九斤曾據大名，金主亮死，中原豪傑並起，耿京聚兵山東，稱天平節度使

，節制山河北忠義軍馬（註二十三），開禧中，兗人畢再遇克泗州（註二十四）自開禧去貞祐，不過十數年間，無怪直接影響於「山東忠義軍」的奮起了。

山東豪傑份子很複雜，系統也各有不同，「是集衆流以成海」的。大概可以分成起義與自保的兩大系統：一、起義者，這可分三個流派，除李全外，有：

（一）楊安兒：這是最初起來的，擅女真帝國的喪鐘的，他的生平，據史載：

『金益都人楊國安，少無賴，以鬻鞍材爲業，市人呼爲楊安兒，泰和中，金人南侵，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割掠，金令州縣招撫之。安兒時爲羣盜，亦請降，隸軍中，累官爲防禦使。及蒙古兵薄中都，安兒至雞鳴山不進……亡歸山東，與張汝楫聚黨，攻掠州縣，山東大擾，後聚萊陽，僭號改元天順』（註二十五），安兒的徒黨很多，後來失敗了，餘黨與李全合流，其經過後面再說。

（二）劉二祖：二祖的身世不詳，續通鑑僅記『嘉定五年金崇慶元年五月，金泰安，劉二祖起兵寇掠淄，沂二州』，大概二祖是泰安人，可是他的力量很大，著名的彭義斌，石珪，時青等皆隸屬於他的麾下，也不幸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」，繼承他是霍儀，又被完顏霆所斬，部下便南下，各投明路去了。

二、自保者：

這裡又可分爲投蒙古和保女真的兩派。他們或是鄉里之豪，結衆自保；或是乘時起事，受環境的變遷，影響他的出處，現在述其重要者如下：

（一）保女真者，以「金末九公」爲例，金史苗道潤傳：『石抹民先，請以高爵募兵，移刺光祖議，「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，假以方面重權，使能各保一方」，九公的封號，依續通鑑是：

王福：滄海公，以清、觀、滄州、鹽山、無棣、樂陵、東光、寧津、吳橋、將陵、阜城、蓆縣隸之。

伊喇重嘉努：河間公，以獻、蠡、深州、河間、肅甯、安平、武強、饒陽、六家莊、祁山寨等隸之。

武仙：恒山公，以真定府、沃、冀、威鎮、甯平、定州、抱犢寨、欒城、南宮縣隸之。
張甫：高陽公，以雄、莫、霸州、高陽、信安、文安、大城、保定、靜海、寶坻、武清、安次縣隸之。

靖安民：易水公，以涿、易、安肅、深州、君民川、三保、河北、江礮、山寨、青白口、朝天寨、水谷、松谷、東安寨隸之。

郭文振：晉陽公，以河北東路皆隸之。

胡天作：平陽公，以平陽、晉安府、隰、吉州隸之。

完顏開：上黨公，以澤、潞、沁州隸之。

燕甯：東莒公，以益都府隸之。

這幾個人有兩人是女真的『猛安謀克』，屯墾漢地，其他皆係漢人而在中原大亂的時候，插旗招兵，自立爲王的。以地區而論，只有上黨、平陽、晉陽之處，是太行山地帶，利用建炎初年「太行豪傑」做基礎，其餘皆是河北、山東與山東豪傑集團有其血緣關係，到後來和他們合從連橫於河淮之間。

（二）投蒙古者：據新舊元史，蒙古的開國功臣中，漢人的份子，多半是聚衆自保的，重要者爲；永清史氏：自史秉直到史天澤、天倪父子兄弟，由於族大丁多，聚衆自保，投降木華黎的。

藁城董氏：『太祖十六年國王木華黎南下，董俊迎降，遂領所募兵爲統帥』（元史董俊傳）。

張子良：『太宗十年，率泗水、西城三十五縣軍民十萬八千餘口，因元帥察罕軍來歸』（元史本傳）。

張榮：金末山東盜起，率鄉民據濟南，豐堂嶺，略有章邱、郡平、濟陽、長山、蒲台、新城，及淄川之地，太祖十六年，榮舉其地納款。（元史本傳）

嚴實：「實挈家壁於青崖山，因木華黎至濟南，實知宋不足恃，遂挈二府六州戶二十六萬詣軍門降。」（新元史本傳）

張柔：金中都留守（苗道潤，之將），行元帥事；太祖十三年，大兵出紫荆口，戰於狼牙嶺，被擒遂以衆降。（續通鑑）。

這些人完全是河北、山東的豪傑，或者得風氣之先（如史氏、董氏）；或者深明強弱的利害（如嚴實）；或是兵敗被俘（如張柔），都放棄了民族的觀點，而投向異族的懷抱中；尤其是嚴實這一個人，老謀深算，智勇深沉，生長於矛盾對立的局面中，運用得宜，成爲蒙古的河上長城。對於山東豪傑的影響也最大，同時蒙古在中國所以成功，未嘗不是這些「棄暗投明」的份子的大力，這真是令天下後世讀史者所痛心扼腕的！

三、山東忠義軍正傳

（一）李全起事

當着金章宗完顏璟的時代，山東豪傑已經瞅着女真王朝將次分解，利用着被奪去土地和忍受猛安謀克榨壓的人民不滿情緒，潛滋着推翻異族，歸向南朝的暗流，徐徐地點起漫天的野火。這其間鄭先領導者，便是後來列入宋史叛臣傳的李全。

當時山東半島上的豪傑之徒，如前所述，大約爲三個力量，我們現在也分爲東西兩路。西路的活動中心，是濟南泰安—徐邳之線，以劉二祖爲代表集團，最先的引導者，可能是開禧中立功淮泗的亮人畢再遇將軍（？），後來投蒙古的嚴實、張榮，大概都會在這個集團裡廝混過。東路的活動中心是益都膠萊—淮楚之線，以楊安兒與李全爲代表集團，益都張林與大刀張林（見附記）等離合其間，最來一線軍事。

李全的本人，宋史本傳說：

「北海農家子，同產兄弟三人，全銳目蠶頭，權誦善下人，以弓馬矯捷，能運鐵槍，時號「李鐵槍」。」

續通鑑在戚拱條下，也有這樣的記載，可是本傳把李全在開禧初年立功的事實抹煞了。這一點是史家的偏見，宋人紀傳對韓侂胄北伐都是認爲輕舉妄動，因此連帶着將李全此事忘却，弄得一個最先領導者的地位，成爲楊安兒，劉二祖的附庸，未免有欠公道。

當楊安兒的「大順王國」之夢幻滅，劉二祖死後，部衆奔向淮水流域，成吉斯汗西征花刺子模，蒙古鐵騎暫緩南侵，女真人的勢力似乎又在山東，河北重整旗鼓。繼大將僕散安貞之後的行省侯摯和蒙古綱，驅策着民兵改組而成的花帽軍，新蒙賜姓的李二措（完顏霆）率領着黃獮，和燕山大俠張惠的一枝人馬，又把東平帥府的陣容充實起來。兵鋒所指，東面指向膠東追趕着楊安兒敗殘兵馬，西北指向運河，鞏固徐邳，招降了青叔姪，趕走了石珪，夏全這些「紅襖餘孽」，這時山東半島上的民軍，只贖下一枝「姑姑軍」——四娘子楊妙真徘徊在膠東的磨旗山，「苦擣待變」破殘的局面。是等待李家兵馬來收拾山河；於是「李二太尉」的兄弟兵起來參加戰鬪了。英雄與美人，天然結合，「慄

悍異常」的四娘子便和「鐵槍將軍」結合，闖蕩二十年的淮海風雲。

當時楊安兒部，以劉全爲首，大將董友、張正中、孫武正等，便隨楊妙真與李全所部合併。李全的部將有李福、劉慶福、鄭衍德、國安用、田四、于洋、于潭等而以劉慶福、國安用、鄭衍德等爲中心人物，以後始終爲山東忠義軍的主力。劉二祖死，由霍儀統率彭義斌、石珪、夏全、時青這一千人馬，暫時退向徐邳一帶，龜山地方，似乎是他們的根據地。這時的山東一帶兵燹之後，丁口稀少，被蒙古和下海上山的勇士造成農民離村的現象，滿地荒榛。女眞的官軍，也並未脫綠林豪傑故態，官吏多是就地產生，還要供應着河上朝廷的兵糧吏俸，災荒便很快地降臨，造成了「各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」的現象，所以彭義斌、時青等均向運河南邊遷移，即是女眞宰相朮虎高琪也打算着南伐弱宋「志在得糧」，這對當時偏安江左，不忘中原的臨安趙宋王朝，實在是一個「可乘之機」。

(二) 忠義軍的成立

南宋對北方的邊防，自來是重上游的。襄陽與武昌（鄂州）號稱重鎮，至於江淮，則只有建康帥府，其重點在沿江。過江不遠的淮南，自高宗趙構放棄揚州，宵渡長江以後，早就視爲「區脫之地」。金人的防務，又着重在淮北、唐、鄧、光汝等地，淮河下游的北岸，也僅有點戍卒游騎。因此淮南、北，便荒蕪了幾十年，作爲雙方用兵攻戰之地，沒有什麼經營。在這方面的南宋將帥，都是些鬪勇之徒，絕無趙方孟珙之在襄陽，余玠之在蜀中的規模措置。所以真德秀上奏說：

「臣自揚之楚之盱眙，沃壤無際，陂湖相連，民皆堅悍強忍，此天賜吾國以屏捍大江，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……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，專爲一司以領之，數年之後，積儲充實，邊民父子爭欲自保，因其什伍，勒以兵法，不待糧餉皆爲精兵……」（註二十六）

後來劉淪又說：

「兩淮之地，藩蔽江南，干戈盜賊之後，宜加經理之」，可以證淮南地形與江防的重要關係，

同時也可證明「棄利於地，棄民於敵」的荒廢情形，當着開禧北伐失敗之後，郭倪之師，狼狽渡江，僅留着畢再遇爲斷後。朝廷諸臣，只是爭着報復私怨，請求斬韓侂胄以緩和敵勢，負人望的丘密雖被任江淮制置使，不久即死，亟亟於掩飾無事，便「放濱、廬二州忠義軍歸農」了（註二十七）。

到了金室南遷之後，僅僅「以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」，宋才有意於「問鼎中原」，於是便恢復忠義軍的接納了。宋史和續通鑑都不願意歸功於李全集團的「歸響正朔」，而把這件大事落向季先與沈鐸兩人，並且引證楊安兒在世便有意歸南：

「安兒之失敗也有意歸宋，招禮宋人，定遠人季先曾爲大俠劉佑家廝養，隨劉佑部網客山陽，安兒見而說之，處以軍職，安兒死，先至山陽」。

「有沈鐸者，鎮江「武鋒卒」也，亡命盜賊山陽，誘致米商，斗米輒售數千倍，應純之償以玉貨，北人至者輒舍之，又說純乞以「歸銅錢」爲名，弛渡淮之禁，來者莫可遏。辟楚州都監，與高忠、高忠召集民兵，忠義民兵，分二道攻金」。（以上註二十八）。

當時守楚州的應純之似有乘時立功名之意。他密聞於朝，謂中原可復，又值「時頻歲少稔」，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，不明言招納，密敕純之慰接之，號忠義軍，就聽節制，給忠義糧。於是山東豪傑便在這樣接納之下，參加忠義軍了。在這裡李全的作用仍未被重視，據說先來的是東海馬良、高林、宋德珍等，李全之衆尙在漣水（這是他取自金人，歷年立功之處，已成爲他們的根據地），一方面，季先又去招納劉二祖系的兵將，那時他們正在徐邳一帶觀望風色，後來復分別歸來，以時青與石珪所部的力量較大。這一部份始終與李全爲敵，我們現在分析忠義軍成立時，即有以下的系統：

一、李全系本部；與楊安兒所部。

二、季先系；東海馬良等（最初成立的忠義軍）與時青、夏全、彭義斌各部。

三、石珪系，毒殺沈鐸，領兵入楚州，造成忠義軍鬧餉的事件，開後來的許多惡例（註二十九）。

三、忠義軍的戰績

在忠義軍集團中所表的戰績，要推李全和彭義斌兩人。西路的時青、夏全祇是首鼠兩端，但宋史對他們的戰功，是不肯怎樣表揚的。我們覆按南宋和金的疆界，從開禧戰敗之後，淮上並無守備，徐、邳、東海、符離、虹縣皆在金人手中，金人一度侵入江邊，遑論山東、河北。「但從忠義軍歸南之後，所有淮海區域，幾乎全部壁返。山東東部的益都路也全部歸來。西路東平帥府所轄濟南、武定各府，北連滄景，也一度奉宋正朔，金所封的東岱公、滄海公、恒山公的轄地，泰半入宋。金人只躡踏於歸德至徐邳一線（後來徐邳也入國安用之手），間有少數屯戍在淮陰左邊，這還不是忠義軍的功績嗎？現在分兩部份略述：

(一) 李全方面

1. 初歸南時：A 取澠水，B 克密州，C 取東海，D 襲莒州。別將于洋克密州，李福克青州。在初期立了這許多大功以後，宋史才大書「京東忠義李全來歸」，宋廷才授以武翼大夫，京東副總管。

2. 屯駐澠水以後，最重要的是渦口之捷，這是金宣宗南渡後大舉伐宋的一役。（續通鑑和宋史李全傳暨賈涉傳都有記載：「金左副元帥僕散安貞圍安定軍及澠、濠光三州……游騎數百至楊林渡、建康大震。時賈涉以淮東提刑知楚州，節制京東忠義……亟遣……李全、李福要其歸路，全進至渦口，與金右都監院石烈牙吾答戰於化湖坡，殺金將數人，得其金牌，金人乃解諸州之圍而去。全追擊敗之於曹家莊，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」）（註三十）。

這路戰績，史家歸功於賈涉，這是不公道的。為什麼不該歸功於賈涉？後面再講。

3. 北略山東，這是李全一生的黃金時代，首先是招降張林，據金史田琢傳。「初蒙古兵克益都，不守而去，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帥府歸金，授治中，凶險不逞，知府田琢失衆心，林逐之遂據益都」。

「全還濰州上塚，揣知林意，乃薄兵青州城下，陳說國家威德，勸林早附；全約挺身入城，惟數人從，林乃開門納之，置酒約爲兄弟表云：「舉諸七十城之全齊；歸我三百年之舊主」。宋史於此事大書「金元帥張林以青、莒、密、登、萊、濰、淄、濱、棣、甯海、濟南十二州來歸」，可見在當時是件大事了。（續通鑑在嘉定十二年書「是歲復京東二府九州四十縣」，在這裡史家還不肯說明是李全的兵力，其實林之歸附，正緣李全的軍隊，已進薄濰密等地，在未有淮南之捷以前，他已經控制金密州及壽光縣（註三十一），才能兵薄城下，使得張林非降不可呢。）

青州既下之後，李全便西略東平，但不幸爲女真的精兵所敗。可是他以其餘威攻取滄州，招降了金滄海公王福，自此李全便專力經營淮海、膠西，做他的根據地了。

(二) 彭義斌方面：彭義斌這個人在忠義軍中是個很重要的份子，對宋最忠實，立功也最大，真正與蒙古人作戰，真正要收復中原的，只有這個人。可是宋史失傳，他的事蹟，只能在同時代有關人物的列傳裡找出。手頭缺少宋、金人的野史，無從考證其詳細的生平，殊爲欠缺，據已知的事實，差不多都是他的戰蹟：（拙著蒙古初期軍略與金之崩潰詳紀彭事可參閱。）

1. 青州之役，彭義斌是李全得力的助手，所以朝廷授爲統制，以後便提兵北伐，我疑心益都張林攻滄州時，義斌也隨往，才能開拓北方的經略。

2. 克山東，駐恩州與李全兵戰，敗之，收得李全的降兵」，這一點續通鑑載之，但未明何以彭義斌能克山東？因此我疑心彭是李全的副將，而不相和洽，而自樹一幟。

3. 團攻東平，招降嚴實（註三十二）。

4. 北伐攻下真定，與武仙聯合，但由於嚴實的內叛，和蒙古主力——木華黎之子李羅的軍隊遭遇，蒙古方面以史天澤爲先鋒，與之搏戰，他孤軍深入，一不勝便大潰被俘，慷慨就義了。關於彭義斌的戰績，新舊元史李羅傳，太祖本紀和金史哀宗本紀和武仙傳均有紀述，足見其在北方的聲勢，假如宋人有大軍後援，忠義軍的內部不分裂，李、彭同心，張林不叛，也許可以澄清中原，不必遠聯蒙古，已可「收復三京」了。

(四) 忠義軍的內鬭

如前所說：忠義軍的集團，原分兩大系統，一是西路的劉二祖系，一是東路的李、楊系，而上面又加上一頂帽子，那便是沈鐸和季先兩個以「穿針引線」的人物，却做了他們的統帥。矛盾便伏在這裡面，後來之亂也出在這裡，姑且不說南宋君臣對他們的防閑運用，即以他們的本身論，從成軍伊始，便已迭開事變，可以分成三個階段。

一、第一階段是石珪跋扈，我們可以說石珪這個人是忠義軍的毒瘤，這個人自始即沒有山東豪傑共有的民族感，而是個奴性十足的人，這個人的生平，據元史本傳：

『石珪泰安新泰人，倜儻不羈，金末渡河率少壯據險自保，與滕州陳技破張都守兵於龜蒙山，又敗宋將鄭元龍於亳州，引兵入肝胎……季先部迎珪爲帥，稱爲大尉，大祖十三年，使葛不罕與宋議和，明年珪令麾下劉順，觀太祖於塔什干城，十五年宋渝盟，珪棄妻子仗劍渡淮』。

石珪爲蒙古攻金被俘，死於汴京，他的兒子小哥，在元任官，這篇傳，相信是取材於他的家傳，充滿了許多掩飾之詞，於此我們當以宋史和續通鑑的紀載核之。宋史李全傳：

「先死，賈涉欲并其軍，先部裴淵，宋德珍、孫武正，及王義深、張山、張友拒而不受，潛迎石珪於肝胎；珪素通好大元，至是殺裴淵而挾武正、德珍等歸大元……漣水軍無所屬」。其實在此之前石珪早已率衆渡淮大掠，開後來忠義開餉的惡例。據續通鑑。

「初山東來歸者日衆，而石珪以計殺沈鐸於漣水……珪乃奪運糧之舟，渡淮大掠，至楚州南渡門焚燬幾盡」：

至於石珪叛走的情形，續通鑑謂：

「漣水忠義軍統帥石珪以入漣水非賈涉意，心懷不安，李全復請討珪，涉遂以全兵列於楚州之南渡門，移淮陰戰艦於淮安……因令一將招珪軍來者，增錢糧，不至者罷支給，衆心遂散；珪殺裴淵，挾孫武正、宋德珍降於蒙古」。

由於石珪的蓄意投元，毒殺沈鐸，巧取季先的部衆，而後才與李全正式衝突，自此以後，夏全、時青的兩部，原係西路系統的，終與李全不能合作，徐邳一帶，敞開門戶，才使紇石烈牙吾答在淮上有一喘息立足之機會，使南宋不能統一兩淮，鞏固北伐——這是一個重要關鍵。

二、第二階段，逼反張林；這是有關忠義軍也是李全成功的大事件。張林這個人，據金史田琢傳，固然加以很壞的批評，那是站在女真人的立場說的。就他出處事跡，實在是個豪傑，他崛起卒伍，重建益都，已領有全齊之半，却聽了李全的一番招降，便拱手歸朝，受官在李全之上，李全和他並肩北伐，直取滄州、河間之地，驍驥乎籠罩阿北。可是由李福的狂躁貪贊，竟然逼反了他：「膠西當登、寧海之衝，百貨輻輳，使兄福爲三窟之計，時互市始通，北人尤重南貨，價值十倍，全誘商人至山陽，以舟浮其貨中分之，自淮海達於膠西，福又具車輶之，而稅其半，然後任聽往他郡貿易，車輶皆督辦於林，林不能堪，於是李馬兒說林歸大元，福狼狽歸楚」（宋史李全本傳）。

張林一反，李全便提兵北上攻打他，這裡面有兩種動機；一是膠西爲商貨的轉口，軍糧私利，大利之所寄，不能放棄；二是金、宋、蒙古的棄地，三國的邊區，沿海有魚鹽之利，又有水陸交通之便，最合理想的根據地，遂不惜舉全力爭之。愈逼的緊，張林投嚮蒙古的心便愈切，索性勾引蒙古人進來。李全雖然再克益都，擒住他送回楚州，但已是兩敗俱傷了。由於李全北上，才引起後方的紛亂，

淮東大亂，忠義瓦解，均由此開始。

第三階段，降人首鼠與劉、李內閥，當李全盛時，原來女真勦辦他的大將賽張飛、張惠，被紂石烈牙吾答逼戰過急，從陣上躍馬歸全、彭義斌的舊將王義深和鎮江軍將范成進，均留在後方，時青本來屯在龜山一度降金封滕陽公，後又投南。淮東之捷，由於時青的叔父時全在金有內應的功勞，所以宋廷對時青很倚重（註三十三）。夏全本是西路大將，久已自成一軍，這些人都屯肝胎、淮安一帶，稱為四總管，乘李全北上，劉慶福在楚州逐許國聯合倡亂，他們便徘徊在朝廷與忠義軍之間。《李全傳》：

「彭托謂夏全曰：『楚城賊黨不滿三千，健將又在山東，劉制使圖之，立功在旦夕，大尉曷往赴！』全欣然領兵往楚城，時青亦自淮陰移屯城內」。

後來夏全被智勇兼全之楊妙真所賺，逐劉璵復回肝胎。這時張惠已與金人有成約，再度北歸，閉門不納，於是他們三人便先後降金做他們的裂土封王之夢。據《金史·哀宗本紀》：

「正大三年十一月，宋忠義軍夏全，自楚州來歸，王義深、范成進、張惠以城降，封四人爲郡王」。

同時在這中間，又發生李福與劉慶福、國安用等與李福的「伙併」，劉慶福以有名的梟將，爲李福殺於臥內（註三十四），國安用等鬧餉，受外方的挑撥，又嗾使部下殺李福，和李全的家眷，楊妙真隻身逃往海州，造成楚州的大混亂。雖然李全趕回來收拾事變，但是良將勁卒，自相誅夷殆盡，忠義軍的實力，到此已是「強弩之末了。『日暮途遠』，遂逼着李全走向「反叛」的一途。

四、南宋的廟謨將略

宋朝傳統的家法是：內重外輕，重文輕武，文臣管兵，武人不帶州郡，軍隊由中央直接統率，禁軍和邊軍輪番更戍，待士卒寬，而將帥無權；賞賜多而餉糧不核實，兵雖多而無用，這些都是有宋一

代的積弱之源。到南宋以後，又添上「重南輕北」的區域界限，宰相一直在南方人的手中，隆興以後迄未脫浙、閩兩省的人士。對北方的歸人，自然地築起一重人事壁壘。偏安江左，湖山吟嘯，對邊帥武臣，一概目爲粗獷，《宋史·余玠傳》，玠召對時即會以此進言。自南宋開國以後，幾次大事件，都似乎有這種界域觀念在作祟，如（一）岳飛之死，岳係河南湯陰人，他的起家，是自河北忠義王彥軍中爲彥提携往南方來的，所以和當日的殿軍——正規軍將帥張浚、韓世忠之流都不和洽（註三十五），後來秦檜作相冤死他，秦檜是南人，同時的四川人張浚也默默無言，不予營救。於是邊軍出身延安的韓世忠，祇好託病謝事了。（二）在此之前苗傅、劉正彥的叛亂，也是北方的邊軍，受不了父法之吏和殿帥的排擠，才起來「逼宮」，我們看他廢高宗而奉元祐太后，可以知其心之無他。（三）曲端爲張浚所殺，端是北將，兀傲自喜，張浚是南人，抱着一種成見，不惜殺之以洩憤！（註卅六）除冤獄之外便是不予重用，如辛棄疾的事例，最好說明。辛棄疾本來是山東忠義軍耿京的幕下，殺賊來歸，文章才智一時無兩，可是所至無權，說他「用財如泥沙，殺人如草芥」，終於鬱鬱而死！當宋高宗趙構還在播遷的時候，汪藻建議：「國家以三衙管兵，而出一兵必待密院之符，祖宗於茲蓋有深意！今諸將之驕，樞密院已不能制，臣恐賊平之後，方勞聖慮……謂宜精擇偏裨十數人，各授以兵數千，直隸御前，而不隸諸將，合爲數萬，以漸銷諸將之權，此萬世之計」（註卅七）。

當時女眞的兵鋒正銳，劉光世、韓世忠，張浚，這些大將方在崎嶇萬難之中，提携些殘兵敗將抵抗大敵，宋室的君臣却已在商量着「銷兵」之計。何況中葉之後，嘉定寶慶之間的君臣？無怪乎自專城上至樞府，都亟亟然以「賊全」爲計呢？

當時的諸將也會作論（註同上）：

「今日之誤國者皆文臣……建議者進講和之論，奉使者持割地之說，提兵勤王則潰散，防河拒險則逃遁，自金人深入中原……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！」

文武如此水火，已非大局之祥，至於南北的界限，紹興時即有向朝廷進言謂「陛下待北人太過」而力試北人的不可信。秦檜歸朝，公然倡「南人歸南，北人歸北」的議論，自是以後，用人取捨之間，南北便有親疏內外的不同。

南宋的廟謨如此，山東忠義軍的南歸，自然也脫不了這種穿插。考忠義軍在宋史所書，大多是變亂的事件，擾攘十五年間，不外是開餉，內閥，逐帥據地，最後是叛國了事。我以為這都是史家的曲筆，事實的真相似不如此。當時的將帥有：

李珏，江淮制置使，嘉定十二年。

賈涉，知盱眙軍，後至淮東制置司（此時已將制置司分爲淮東西三處）
許國，原淮西都統，轉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楚州。

徐晞稷，倅楚，守海繼許國爲淮東制置使。

劉璋，知盱眙軍，繼徐晞稷爲淮東制置使。

姚綈，原通判楚州，繼劉璋爲淮東制置使。

彭忙，初爲鎮江軍統，繼知盱眙軍。

楊紹雲，以楊州帥兼楚州制軍。

以上諸人覆按史傳，都是些庸懦不識大體之人。諸人中賈涉這個人是造成亂事的禍首，許國不過是個莽夫而已，據他的本傳。

「字濟川天台人，通判真州，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，淮人季先、沈鐸，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……李全等以其衆至，先招石珪、葛平、楊德廣通號「忠義軍」，珪等反斃鐸於漣水。純之罷，通判梁丙行守事，欲省其糧使自潰，珪等以漣水諸軍渡淮，屯南渡門，焚掠幾盡，丙遣季先拒之不止，事甚危——涉上書主「定額自成一軍處北岸」授淮東提點刑獄，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。涉密

使季先以計殺葛平等，而先之勢孤，分珪，孝忠（陳）夏全等爲兩屯，李全爲五砦，令諸軍汰者三萬有奇，朝廷歲有費十三、四……李全卒以爵賞爲節度使，涉又言「盜賊血氣正盛，官職過分，將有後憂」。

又據李全傳和續通鑑

「李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，以漣水忠義副都統季先威望出已上，陰結賈涉軍吏莫覬，使譖先欲反，涉信之，令先赴樞密院議事，殺之於道，而遣統制陳選總其衆於漣水」。

從國家民族的大處着眼，山東忠義軍的集團，應該是個整體，不能使之分裂。他們作前驅，而淮楚的正規軍——鎮江軍繼之前進，才能北定中原，爭衡天下；退亦可保有山東，屏障江淮，即爲地方計，帥府對這些忠義人，也應該「輯睦行陣」，使他們不能生事，徐徐訓練，納諸正軌，培養將材成爲大用。可惜當時見不及此，果然季先一死，北歸的忠義人無所歸屬，只好北迎跋扈反側的石珪做統帥，而不敢接受陳選的節制，這樣便造成了忠義軍大部份力量的消亡。內部火併，石珪北走，北方的豪傑從此更無人來歸，嚴實、張榮之流，只好投向新朝爲異族効力了。

賈涉所用的手法，完全是一「刀筆吏」的伎倆，所着眼全在省費名賞，壓抑有功。事前梁丙的省糧，使忠義軍的內潰已造成開餉的一幕，使社會上對忠義軍蒙上不良的印象。賈涉繼之「汰者三萬有奇，爲朝廷省費十三四」，不知道用多少稽難的手續，才有這樣的成績，！還進言朝廷，不使盜賊有過分之想，目忠義軍爲盜賊，又豈怪壯士寒心，甘心「報國」呢？同時他那種分割忠義力量的辦法，決不是爲國家民族謀恢復，續通鑑載：

「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，又分帳前忠義萬人，令趙邦永、高友統五千屯城西，王暉、于潭統五千屯淮陰……」

這樣的犬牙相錯，分屯列戍，又怎能使北軍安心？既待之以盜賊，他們只好以「盜賊」自待了。

我還疑心當日的「忠義糧」有問題，以史彌遠在朝的貪贓，帥臣那能夠無所進奉？尅扣兵糧之事恐不能免，不然爲什麼每次事變，都以開餉爲口實呢？

許國的罪狀，史官說他對楊妙真無禮，幕客逼劉慶福「貌喏」（喏是宋人朝拜的禮節，貌喏是在堂簾以外，便行喏，類似舊劇所謂的「報門而進」），其實這是皮相之言，最主要的是存他心排擠，要銷滅忠義軍；他的出身是隨州守，續通鑑載過孟宗政守襄陽。

「宗政隨方力拒，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，鼓聲相聞」。

李全傳和續通鑑都說：

「國奉祠家居，欲傾賈涉而代之，數言李全必反，會涉死，召國人對，國疏，全謀益深，反狀已露，非有豪傑不能消弭」。

這可見他是居心要消滅忠義軍以取功名了。所以有這種動機，個人取功名之外，還有系統的成見，他大概是「殿前」的出身，素來看不起北方忠義的，這大概是傳統的觀念。許國知州，無怪乎李全內心不服，惴惴然惟身家之不保，才有劉慶福楚州之亂。至於這個莽夫的舉措，真令人嘲笑皆非！我們看下面的一段記載：

「許國至鎮，李全妻楊妙真郊迎，國辭不見，妙真慚而歸，國既視事，痛抑北軍，有與南軍競者，無曲直偏坐之，犒賞十損八九」。

「（全）遂還楚州，上謁，賓贊戒全曰：「節使當庭趨，制使當免禮，及庭趨，國端坐納全拜，全大怒曰：全歸朝，拜人多矣，但恨汝非文臣！本與我等，汝向以淮西都統謁賈制帥，亦免汝拜，汝有何助伐，一旦位我上，便不相假借耶？」

「因會集間出劄白事，國見其細故，判從之，全即喜拜謝，自是動息必請，得請必拜。國喜曰：『吾折服此子矣！』帥臣的顛頓如此；度量的窄狹如此，怎能夠統率住這些龍跳虎臥的草莽英雄？最奇

怪是當時的朝廷大臣，只有建議防制的，沒有主張安輯撫綏以爲後用的；這恐怕由於秦檜主和之後的一脈心傳，以苟安爲得計，以恢復爲開闢的朝野風氣所釀成，當時負重望的如喬行簡：理宗即位時上言：

「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，以人則邊陲之大將，一旦爲李全所戮，是必疑其終爲我用，慮變生肘腋也，莫若乘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，使護其軍！」

史又稱：「李全反叛已著，史彌遠當視爲緩圖，人不敢言，權兵部侍郎李宗勛累疏及之」〔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云，與樞密袁詔，尚書范楷會議請討〕，這樣便逼出李全造反，揚州一役，原來是恢復山河抗拒敵虜的山東忠義，一變爲千古唾罵的叛賊，而瓦解冰消了！毀江淮的屏障；成全豎子的助名，事勢如斯，只有眼望着蒙古人長驅過江，臨安受降吧！

四、大悲劇的收場

這是一幕大悲劇，對於山東豪傑的集團，尤其是李全本身，真是殘酷的打擊！以「忠義」始，以「叛逆終」，對於少數人的名節，關係還小；最難堪的，是漢族從此不能團結起爲一個阻擊韃靼的力量，不能收復河山，重建周、秦、漢、唐的天下，反而把大江以南的乾淨土地也斷送了，和北宋王朝走上同樣覆亡的途徑，這真是無比的罪惡！當時導演此大悲劇的人物，實在不能辭其責。

此一悲劇以李全爲主人，在前面我們說過，李全是再度燃起山東豪傑起義之烽火的人物。從他一起事到南歸的初期，我們可以測知他決不是尋常人物，對女真崩潰，蒙古入侵的混亂的局面，無疑的他是有番打算。不獨是他，便是楊安兒、劉二祖這一夥「紅襪賊」也是有一番打算的。從史籍的片段的記載來看，他們顯然打算「自成一局」，在女真與宋之間，自成局面而奉南宋朝廷的名號，以號召人民。這中間，楊安兒的野心最大，一起事便要做皇帝，被僕散安貞把他打垮，才加強了其他人物投南的決心。季先是想拉攏這些不同力量，自家做「老大哥」樹功名，不幸和李全兩雄不並立，遭受迫

害，粉碎了「盟主之夢」。至於李全則傾宋之心較切，南歸的初期，確有意於爲「朝廷効力」，但缺少政治素養，碰上賈涉這個好弄權術的統帥，又加上處心消滅他們勢力的許國忠心動搖了，所部的力量日益雄壯，地區日益擴大，南方朝廷的弱點日益暴露，於是向日的雄心再度挑起，部下桀驁之徒，迭次造亂生事，又有個野心跋扈機智慄悍的「賢內助」在煽風吹火，而歷史上桓溫、劉裕、侯景之例，許多政客文人——馮洎、張國明等又在教導着他，便索性起了「問鼎錢塘」之念。但是不幸環境在變，好機會也過去了，局中人却不知道，又加上兩趙的煎迫，自身家族，被殘害的憤火，終於他孤注一擲，死於揚州城下。這是此一悲劇的演變過程，以下我們分別引徵：

一、何以說他南歸初期效忠朝廷呢？在這裡舉出幾件事實：

「嘉定十二年，石珪率兵二萬渡淮大掠，梁丙乃遣李全出諭之」

「同年十二月大雨雪，淮冰，李全請於賈涉曰，每恨泗州阻水，今爲平地矣！請取東西城自效，涉許之，全以長槍三千人，夜半渡淮，向泗之東城；」（續通鑑）。

「嘉定十三年十一月，連水忠義軍統轄石珪以入連水非賈涉意，心懷不安，李全復請討珪，遂以全兵列於楚州之南渡門」（續通鑑）。

當忠義軍鬧餉紛亂之時，惟李全足以諭之；忠義軍的叛徒，惟李全足以討之，天寒雨雪而願踏冰攻城，是不是忠誠爲國？我們再看有名的渦口之捷，正規軍諸將都已潰敗，金兵游騎已抵楊林——這是金主亮南伐所至之地，沒有李全的偏師取勝，淮南豈不全入女真？那時汴梁的金朝，用高琪之計，舉精騎二十萬渡淮南戰，正想取江淮以自濟，宋人韓侂胄敗後，淮南只是些屬冗無能的文武，不是忠義軍這一股新的力量來抵擋一陣，恐怕又要重演紹興年間遁逃明州的故事呢？

二、何以說他無政治素養呢？史稱他自渦口之捷，有輕諸將之心。爲什麼他輕諸將？史載建炎年間酈瓊降金語其同列曰：「江南將帥，才能不及中人，每當出兵，必身居數百里外，謂之持重——幸

一小捷則露布飛馳，縱或親臨亦必遠遁」這是李全以前幾十年的事實。中葉以後，習氣更甚！又何怪李全的輕視？但以一個新進的草茅，而睥睨舊將，毋怪其爲許國之徒所排擠了。又考嚴寶附宋，舉魏、博、恩、懷、衛、閩、相等郡來歸，賈涉再遣趙拱往諭配兵二千，李全亦請往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行，趙拱說以「乘勝取東平」，遂敗於金將王庭玉，這一段事實，關係着嚴寶的出處，也影響了山東、河北的大局。當時木華黎的兵尚未渡河，嚴寶的力量的確可以左右南北，由於李全這一舉的輕率，才引起嚴寶的輕視，而甘向異族投降以自保，都是趙拱幾句話激出來的，文人的可惡在此！李全如果有政治素養，能夠持重不發，先與嚴寶聯合，以忠義鎮守濟南一帶，全力擊破東平，先行統一山東，後來彭義斌北伐，便有了後援，不致於孤軍深入遭受挫折，北方的大局正未可知呢？——當然無許國被殺的一幕，義斌也不會與李全反臉，彭、李合兵，局面當不會壞到如此。

三、何以說南方朝野的弱點暴露呢，於此我們要了解宋理宗即位時，和濟王爭位，以及湖州事變的一幕。據宋史理宗本紀：

「嘉定十三年八月景獻太子薨，甯宗以國本未立，選太祖世孫年十五以上者教育，如孝宗故事，遂以十四年六月立貴和爲皇子，改賜名昀，而以帝嗣（理宗）沂王，八月甲子授右監門衛大將軍，賜名貴誠，會濟王翊與史彌遠有違言，彌遠曰媒孽之，寧宗屬意於翊而未遂，寧宗不豫，自是不視朝，彌遠遺詔以貴誠爲皇子，賜名昀，帝即位，封翊爲濟王，賜第湖州，以醴泉使就第；」（續通鑑紀這件「狸貓換太子」的故事：

「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，后不可曰：「皇子翊先帝所立，豈敢擅變」，谷等一夜七往返，后終不許，谷等乃拜泣曰「內外軍民皆已歸心，苟不立之，禍變必生，則楊氏無噍類矣！」后默然良久曰「其人安在？」彌遠即于禁中宣昀令之曰「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，非萬歲巷皇子……」，翊時聞帝崩，跂俟宣召，久而不至……昀入宮見后，后撫其背曰：「汝今爲吾子矣」，然後召翊至

則每過宮門，禁衛拒其從者，彌遠亦引疾至柩前舉哀畢，引出帷，殿帥夏震守之……」

濟王竑本來是甯宗立爲皇子，應該嗣爲皇帝，只以開罪史彌遠，史載其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，「於几上書彌遠當決配八千里，竑又嘗稱彌遠爲新恩，以他日非新州即恩州也！」彌遠聞之，因七月七日進七巧奇玩，以觀其意，竑乘醉碎之於地，彌遠大懼……與彌遠同時倒濟王的，還有鄭清之——即後來主張討李全最力的宰相——彌遠曾密告以「皇子不堪重荷，聞後沂邸者甚賢，君其善訓導之！事成彌遠之座即君座也」。於是鄭清之後來果合力共謀廢立，在甯宗趙擴病篤之時，彌遠即派清之去沂王府，「告貴誠以將立之意」，內裡面再有楊皇后作主，濟王便只有退居到湖州了。但宮廷的「私憾密謀」，是掩不過天下耳目的，天下不平，便有了「湖州之變」。

所謂湖州事變是這樣：

「湖州人潘王與其弟丙，從兄甫，以史彌遠廢立不平，乃遣甫密謀立濟王之意於李全，全欲坐觀成敗陽與之日期，進兵應接，實無意也。王等信之，遂部分其家衆以待，及期全兵不至，王等懼事洩，及其黨：揚言自山東來，夜入州城求濟王竑：擁至州治，以黃袍加竑身：王偽爲李全榜揭於門數史彌遠廢立罪；明日視之，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，竑知事不成，乃遣王元春告於朝，而率州兵討王，王變姓名走，丙、甫皆死；彌遠懼甚，急召殿司將彭忠帥師赴之：王走至楚州爲小校明亮所獲，送臨安斬之，彌遠詐踪有疾；逼竑縊於州治，以疾卒聞」（續通鑑）。

這次事變，李全與之有結合的痕跡。濟王在此事變中冤死，朝廷內外議論紛紛，濟王死後，真德秀即說：「霅州（湖州）之變，非濟王本志」，同時又有人咏詩「梧桐秋雨何王府，楊柳春風彼相橋」，以肆譏訕，又引起江湖集之文字獄（註三十八），可是史彌遠藉此去了眼中釘。又因湖州之變，而牽恨到李全，必欲除去。所以拔彭忠知盱眙軍，以分散李全和夏全等結合，用自家的姻親趙善湘，做江淮制帥，以鄭清之學生趙范、趙葵擔負防制剿滅李全的重責，皆是由此事爲出發點。這個弱點透

露在李全眼中，他不造反，便只有走岳端、岳飛的路線！在此以前，李全會至鎮江，本傳記他：

「嘗遊金山，作佛事以薦國殤，知鎮江府喬行簡，以方舟逆全，大合樂以享之，全歸語其徒曰：

『江南佳麗無比，須與若等一到』！」

以這樣不學無術的武夫，那經得起物質環境的誘惑？但這件事却是那岸然道貌，後來平章軍國重要，又會建議箝制忠義軍的喬行簡所做出來的。官場的風氣如此，足見江南的頹敗，更啓李全輕視之意。

四、何以說是他再度挑起做「自成局面」的雄心呢？我詳細研究李全的個性，民族意識很強烈，英雄觀念也濃厚。有幾點可以證明；第一是他被圍青州之時，本傳和元史李羅傳都載他的不得已降蒙古的經過，謂：「全退入城，城中食盡，乃焚香再拜，將自剄，鄭衍德等救之曰：『譬如爲衣，有身愁無袖耶？北去未必非福，』遂出降。蒙古諸將皆曰『勢窮而降，非心腹也，不誅必爲禍』，幸李羅不許，仍授以山東行省這可證明降元是萬不得已事」。第二、在他攻揚州之時，還着南朝服裝，「大元宣差」謂之曰：「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，乃心終在南方耳」，金乃取誥勅褫焚之，嘆曰「國明誤我」，淚下如雨！更足見他始終心響本族。可是環境逼之過甚，當面的敵人又太強，試想當青州被圍之日，正劉璋、彭忠輩環攻他的根據地——漣水楚州，圖謀他最劇烈之時。據金史白華傳，記李全和劉璋的關係，華奏「全初在楚州，從劉璋，州人訛言劉大帥來屠城中北人耳」，是時李全在圍中，夏全提兵往入楚城，才激起淮上第二次的變亂。（第一次是劉慶福殺許國）。如果劉璋、彭忠等能早一日調兵北上，應接青州，不惟李全不會降元，山東、淮海之地，還可以保全。這是「誰爲之咎」呢：第三是李全當日確在金、宋、元間，有其存在的力量。據金史白華傳，說他「借大兵之勢，要宋人供給餽餉」，石抹民安說：「宋人以虛名致李全，遂有山東之地」，後來國安用降金，建議經營山東，

說山東之地「富庶甲天下，東連沂、海，西接徐、邳，南扼盱、楚，北控淄、沂」；又金史哀宗本紀載，以王爵招李全，全曰：「王義深、范成進皆我部曲，西受王封，何以處我？」自視以此，實力如此，那能不有英雄觀念呢？

五、何以說他的部下與其妻楊妙真的煽動呢？李全第一次在青遣劉慶福回漣水，是伺查許國的動靜。第二次在青州圍城，遣其兄李福回楚卅，是調兵乞援。史家都歸罪於他爲有意造亂，未免太冤！可是楊妙真的指使其部衆造亂的行爲，却彰彰在人耳目。續通鑑載「許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，大閱楚城外！楊妙真及軍校留者，懼其謀已，自爲備……適潘王事敗，全黨亦不安……慶福謀中輟，欲決意於國……一日國起視事，忽露刃充廷……流血蔽面而走……」又載「全聞國死，自青還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，斬數人，上表待罪……」，迨後劉慶福與李福又失和，李福於臥內殺之，又藉口逐姚猶，殺幕客高夢先輩，以致「江淮之民，靡有甯居」，後來國安用等又殺李福並及李全的家屬，足見部衆生事，本人也難管制。在淮東各次事變中，楊妙真始終是個主角，枕席之間而主張造反，李全怎能不低首聽命於這個「膳脂虎」呢。（以上事實均見全本傳）。

六、何以說是政客文人的誘導呢？當李全招降青州即有鴻泊爲作表奏，後來事敗，淮安迎降，又是鴻泊（見續通鑑）。徐晞稷在未得制閫之前，即箋注許國的奏疏，透露給李全部衆，以致於引起後來的變亂。在李全已和兩淮制府決裂之時，又有通判張德明，爲之入朝遊說：「李太尉英武絕人，射四百五十步」，後來李全自悔「德明誤我」，足證張德明是怎樣的勸他「造反」的。中國的讀書人，世亂時危總喜習於縱橫，如蒯通勸韓信自立，鄒超爲桓溫畫策，崔胤以唐室的宰相，却勾結朱全忠篡唐，均有先例。所以我斷定李全後來的變節，文人政客的勸導，是有其相當的作用。他的左右有李英、李平兩兄弟胥吏出身的人物，爲他晝夜畫策，恐怕也是些乘險徼幸的冒險家？王船山讀通鑑論，曾說，躁人難與共功名」，李全的吃虧，正在這個「躁」字上面。

從以上的六點看，我們說李全是民族意識與英雄觀念交織的人物，大概不致有甚大的錯誤。所憾的是他和南宋，都未看清當時環境，在淮上內閼之時，蒙古人已西征得手，定計南伐，在成吉斯汗遺囑中，已定下聯宋滅金再來滅宋的計劃。自太行以南，交給公忠體國的太師國王木華黎之後，聽了北方降人之言，戢兵不殺。北方大亂之後，人思休息，由於畏威懷德的心理，許多北方豪傑已爭着拉攏蒙古，爲之剪除女真餘孽，安定地方。人民的心理從「投嚮南方，興復漢室的狀態」，轉向新朝，山東豪傑的內閼，使得河、淮之間，民無寧日，已無法取得民心。尤其是山東在大難之餘，丁口稀少，農田荒蕪，再也不是個取之不竭的府藏忠義軍既不能得到南方的接濟，那只有向北方投靠，以李全的跋扈，僅受兩個宣差的脅迫，便自焚南方冠服，躍馬投槍於揚州城下；二趙足弟以駕下之材，將脆弱之衆，却收到殲厥渠魁，收復兩淮的偉蹟！是天意嗎？是人事嗎？只有讓讀史者自己猜想吧！

註一，見金史太祖本紀。

註二，「猛安」者，千夫長地，「謀克」者，百夫長也，太祖始以百戶謀克，十謀克爲猛安，繼而諸部來降，率用「猛安謀克」之名，以授其首領，而部伍其人，見金史兵志。

註三，見金史食貨志及金史太祖本紀。

註四，金史兵志。

註五，金史世宗本紀及食貨志。

註六，「合扎」者，言親軍也，金史兵志。

註七，畢沅續通鑑一百五十六及金史章宗本紀卷。

註八，宋柳永樂章集，清人白香詞譜箋註引。

註九，畢氏續通鑑一百六十六紀金亡之事，「金自南遷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，無事相習，低言緩語，互相推讓，以爲養「相體」，每有四方災異，民間疾苦將以奏，必曰「恐傷聖主心」。

註十，王國維觀堂集林韃靼考。

註十一，王國維觀堂集林遼金時蒙古考。

註十二，新元史耶律阿海傳，移捏刺兒傳及元史太祖本紀。

註十三，畢沅續通鑑卷一百十九。

註十四，元史太祖本紀。

註十五，王國維觀堂集林，主因亦兒堅考。

註十六，元史太祖本紀及畢氏續通鑑。

註十七，元史耶律留哥傳。

註十八，元史蒲鮮萬奴傳。

註十九，新元史木華黎傳。

註二十，畢沅續通鑑卷一百六十。

註二十一，元史史秉直傳。

註二十二，畢沅續通鑑卷一百一一三。

註二十三，宋史辛棄疾傳。

註二十四，續通鑑。

註二十五，見金史僕散安貞傳。

註二十六，宋史真德秀傳及畢氏續通鑑卷一百五十九。

註二十七，畢氏續通鑑卷一百五十九。

註二十八，元史石珪傳，宋史李全傳及續通鑑卷一百六十一。

註二十九，畢氏續通鑑卷三百六十一，賈涉主管淮東制置條及宋史賈涉傳。

註三十，李全傳及續通鑑一百六十一，僕散安貞條。

註三十一，李全克密州壽光，金史宣宗本紀及宋史本傳，暨畢氏續通鑑均載之，密州守將黃摶金之勇將，即在是役被擒斬，金東平帥府的實力大損。

註三十二，元史嚴實傳，續通鑑卷一百六十二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條。

註三十三，金史時青傳及續通鑑卷一百六十二，金額爾克（訛可）時青等由潁壽渡淮……獲生口還言，時全之侄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，全匿其事；諸軍將渡，全矯稱密旨諸軍旨留，金兵大敗……金之兵財由是大竭，金主詔數全罪誅之。又宋對時青倚重，見續通鑑一百六十四：「九月庚子詔時青堅守淮，獨當一面，屢有戰捷，除武康軍節度使；忠義都統制。」

註三十四，宋史李全傳，國安用等五人殺李福、全回、安用殺張林、邢德以自贖，王義深走降金。

註三十五，畢氏續通鑑卷一百十六，湖寇既平……時岳飛以列校拔起，世忠（韓）、俊（張）不能平，岳皆屈己下之，數通書，俱不答，及飛破楊太，獻樓船各一，兵徒戰守之具既備，世忠始大悅，俊益忌之。

註三十六，宋史岳飛傳及畢氏續通鑑卷一百九，張浚奏岳飛條。

註三十七，畢氏續通鑑一〇九卷，詔台諫條具保明羣盜，遏敵患，生國財條。

註三十八，清梁紹壬兩般秋雨庵筆記錄宋碑。

後記

壹、宋史李全傳，文字踳駁，又欠清晰，必須參合金史看，才能得較明確的印象。（續通鑑則記的很明白，但也有未交代之處，如張林這個人名有二：一是益都張林，在金史田琢傳中，一是大刀張林

在金史蒙古綱傳中，前者是投降李全，後又北降爲李全所擄，但在歸蒙古後，又名張琳，元史太祖本紀和李羅傳都如此寫「續通鑑仍之」；後者爲蒙古綱王庭玉戰敗，投降女真，又在金人不守時降宋，宋史甯宗本紀和續通鑑都載着「張林與所部邢德來歸，復以京東副總管進之官」。這兩個人後亦爲李全所拘留在楚州造亂被殺。但益都張林，自李全破青州執之送楚州後，便無下落，因此讀者很容易誤會。楚州造亂的張林即此張林，元史對張琳無傳，不及金史關於完顏霆，（李二措），張惠等均有傳，較爲詳實。又李全亦有兩人，其一，曾爲金中山治中，與武仙結合叛蒙古，被史天澤擒斬，多桑書紀其事，此人恐怕也是起自地方的義軍。

貳、李全所活動的地區，據宋史地理志如此：

(一)淮南東路州十，楊、毫、宿、楚、海、泰、泗、淮、真、滁，軍二，高郵，漣水，縣三十八。南渡後州九，楊、楚、海、泰、泗、滁、淮安、真、通，軍四，爲淮東路，宿，毫不與焉。

(二)揚州元帥府，宋高宗建炎元年升帥府，嘉定中淮東制置，開幕府於楚州，仍兼安撫。

(三)楚州（繁）山陽郡團練，建炎四年置楚（舊承州），漣水軍鎮撫使，淮東安撫制置使，京東、河北鎮撫大使，紹興五年權廢承州兩縣，和、廬、濠、黃、滁、楚州各一縣，置鎮官，三十年，漣水復來屬。嘉定初，節制本路沿邊軍馬，十年制置安撫司公事，寶慶三年升寶應縣爲州，紹定元年，升山陽縣爲淮安軍，端平元年，改軍爲淮安州（李全叛後漣水已入蒙古，淮陰一度入金），縣四，山陽（望），鹽城，寶應。

(四) 海州：上東海郡，團練，建炎年間入於金。紹興七年復，隆興初割以畀金，隸山東路，以漣水軍來屬。嘉定十二年復。寶慶末李全據之，紹定四年，全死後，端平二年徙治東海縣，淳祐十二年，全子壇又據之，治朐山，景定二年壇降，置西海州，縣四，朐山、懷仁、沐陽、東海。

(五) 青州：望北海郡，鎮海軍節度使，（望）益都，濰州上團練，建隆二年，以青州北海縣建

爲北海軍。

以上各地在今蘇北、皖北及山東東部。

參、宋史賈涉本傳對他很恭維，這裡有兩個原因：第一是自孝宗北伐被阻之後，南宋朝野都怕開邊生事，道學先生都反對輕言恢復，對北來忠義大都視爲粗獷或盜賊，賈涉裁抑李全，削弱忠義軍，當時未嘗不以爲正確的，作傳的也引他的上史彌遠書沾沾自喜。第二，他的女兒入宮爲理宗妃，其子賈似道即以外戚入相，權傾朝野，史官對他父親的傳。當然有所藻飾。其實此人的窄狹好弄權術，淮東局面正是壞於他手。又在這次大事變中，有趙拱和苟夢玉兩人，都顯示有相當的作用。考兩人均會奉使蒙古，有名的蒙韃備錄，據近人王國維先生考證是趙拱所撰，誤題「孟拱，這個人一言喪邦，使宋人不得收攬嚴實，後來在楊州，智拒汪文信，保全地方，也算是「善於補過」的了。苟夢玉也是文章之士，曾奉使蒙古見過成吉斯汗，在事變中本來想投機，却死在劉慶福手中，可謂不善處亂世者。肆，「二趙」，趙葵、趙范宋史均有傳，是端平之役的禍首，趙范後鎮襄陽，所部北軍，叛降蒙古，襄陽淪陷，即是他的「政績」。